

宋本 史记注译

第一册

主编

霍松林
赵望秦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汉 司马迁 撰
宋 裴 駰 集解
唐 司马贞 索隐
唐 张守节 正义

霍松林 赵望秦 主编

宋本 史记 注译

第一册
卷一至卷七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主编

霍松林

常务主编

赵望秦

初稿撰者

霍松林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望秦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新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安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功振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志慧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颖科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黄伟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宋纹纘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宏洪	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永如	扬州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家平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稿撰者

赵望秦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培峰	商洛学院中文系讲师
蔡丹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璐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冯瑾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李婵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贾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爲綱爲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下

姓與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

尚書傳字作敷馬融曰數分也。索隱曰大戴

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傳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謂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尚書作隨山

刊定高山大川

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駟案尚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

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

馬融曰祭祀豐絜

里宮室致費於溝洫

包氏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

爲成或廣深八尺

陸行乘車水行乘舫泥行乘橇

徐

曰他書或作藹駟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薄曰橇音茅藹之藹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正義曰按橇

形如舫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温州海邊有之也

山行乘橦

廣

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
姓興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尚書傳字作數馬融曰數分也。索隱曰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傳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謂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表木謂刊木立為表記尚書作隨山刊定高山大川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駟案尚木定高山大川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
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
馬融曰祭祀豐絜卑宮室致費於溝洫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有溝溝廣深八尺陸行乘車水行乘舫泥行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絕駟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擡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絕之絕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正義曰按橇形如舫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擡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温州海邊有之也山行乘橦徐廣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所收張元濟輯校宋黃善夫刻本《史記·夏本紀》，右數一行及二行“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之“百”字，為張元濟所校改。

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
迪率典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
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今我民
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
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
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
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
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
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
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
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正義曰括地志云比干見微
子去箕子狂乃數曰主過不

日本影印宋黃善夫刻本《史記·殷本紀》，右數七行“微子數諫”，右數九行“迺強諫紂”之二“諫”字，均誤。

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
迪率典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今我民
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
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
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
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
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
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
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
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正義曰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所收張元濟輯校宋黃善夫刻本《史記·殷本紀》，右數七行“微子數諫”、右數九行“迺強諫紂”之二“諫”字，均爲張元濟所校改。

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以目厲相眦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正義曰上詩風刺謏獻典韋昭曰典樂典史獻書正義曰史太史也上書諫師箴正義曰音針師樂大瞽賦韋昭曰無眸子曰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禮矇主絃歌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昭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正義曰傳音逐近臣緣反庶人微賤見時得失不得言乃在街巷相傳語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察正義曰言親戚補王過失及察是非也瞽史敎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所收張元濟輯校宋黃善夫刻本《史記·周本紀》，右數六行“謏獻典”之“典”字，及注文“典，樂典”之二“典”字，均誤；中華書局點校本作“曲”，是，當改。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期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复次，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此期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藉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

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本方向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本研究方向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人民的喜爱，已经被选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本方向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

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 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汉唐文学研究丛书》、《长安学术丛书》、《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序 言

霍松林

自传说中的炎帝、黄帝经夏、商而至西周，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周室衰微，五霸争雄，七雄竞起，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秦始皇“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①，废分封诸侯之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收兵器，定币制，书同文，车同轨，一法度衡石丈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统一，经济文化高潮眼看就要到来。可惜秦始皇不顾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依然坚持暴政，焚书坑儒，虐用其民，民不堪命，于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②，并起而亡秦，空前强大的秦王朝便迅速瓦解于全国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之中。

西汉是继秦王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汉承秦制”，却吸取秦王朝“仁义不施”的教训，针对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疮伤，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出现了中国封建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据《史记·平准书》所述，从汉兴至武帝初即位的七十馀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派张骞通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又派唐蒙至夜郎，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用卫青、霍去病为将，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力的雄厚，疆域的拓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东方巨人的崛起创造了条

件，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化高潮以空前磅礴的气势奔腾而至，要求人们对炎黄以来数千年的文化进行总结。而及时肩负起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便是世界文化巨人司马迁；对炎黄以来数千年文化作出全面总结的，便是司马迁以数十年心血凝聚而成的宏伟巨著《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人。出身于史官世家，其远祖在周朝累世任史官。其父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③，博学多闻，精通先秦古籍及诸子百家之学，在汉武帝时长期任太史令。其《论六家要指》对儒、道、法、墨、名、阴阳各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司马迁童年“耕牧河山之阳”^④。十岁赴长安，在父亲指导下博览群书。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由于掌管天文术数、备知天地古今万物而成为文化学术之宗，带有皇家学术顾问的意味，是当时最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司马谈因其先祖“世典周史”^⑤，渴望克绍箕裘，重建史官家世，自然以史官的标准培养儿子。从《史记》看，司马迁所接受的，不仅是作为一个史官应首先具备的天文星历等天官知识，还有上古三代的王官学和战国时代的百家学以及其他文献，包括了从上古至当时的所有文化学术成果。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⑥。从这次壮游的路线看，他是先从文献中了解了大禹、孔子、屈原等伟大人物和楚汉战争的风云变化，心灵为之震荡，然后才沿着历史留下的闪光足迹进行实地考察和审美体验。在《史记》的有关篇章中，可与此相印证的记述屡见不鲜，例如：

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主，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

——《越王勾践世家》

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孔子世家》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屈原贾生列传》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

——《信陵君列传》

吾适丰、沛间，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

——《樊酈滕灌列传》

在对历史遗迹、遗闻的考察、访问、凭吊、向往中受其感发，驰骋想象，视通八极，神游百代，从而开拓心胸，砥砺人品，激扬英风浩气，培养壮志豪情。这与遍览群籍，博古通今相辅相成，为《史记》的撰写准备了重要条件。宋人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⑦宋人马存说：“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⑧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云：“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

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⑨

司马迁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不久，任郎中。汉制：二千石高级官员的子弟得以恩荫为郎官。司马谈为太史令，秩六百石，其子被提拔为郎中，可算特殊待遇。郎中“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⑩，得随侍皇帝，故司马迁自谓“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⑪。因此，他于元鼎五元（前112）跟随汉武帝西到崆峒。次年，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⑫。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又追随武帝东封泰山，游览了山东半岛，北向至碣石，经辽西一带，北达九原，自直道返回长安。他在《史记》中多次提到这次东部、北部之行的经历和感受：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齐太公世家》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蒙恬列传》

此后，司马迁还跟随武帝到过不少地方，其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所到之处，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情风俗，印证历史文献，补史料之不足，正传闻之讹误，对于完成《史记》的浩大工程起了奠基作用。

司马谈跟随武帝东封泰山，行至洛阳时忽患重病，危在旦夕。司马迁出使西南回来，追赶封禅大军，当追到洛阳时得悉父亲病危，急往探视，司马谈“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⑬父亲涕泣嘱咐和儿子涕泣受命的情景跃然纸上，至今读之，犹令人感动不已。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任太史令，阅读“石室金匱”（国家图书馆）之书，整理历史资料，为实现他父亲著述史书的遗愿而倾注全部心力。太初元年（前104），在主持改革历法，制定《太初历》之后，便正式着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武帝，被处以宫刑。事件的经过及对司马迁生理、特别是心理上的严酷摧残，详见《报任少卿书》中。“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馀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⑭这的确是值得赞扬和同情的。然而最后未能杀身成仁，却是不值得辩护的。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只是出于爱惜这位“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名将，并认为他虽然暂时降敌，但其用意在于“欲得其当而报汉”，这才“欲以广主上之意”，效“拳拳之忠”，^⑮岂料所得到的却是惨绝人寰的处罚！被赦出狱后，司马迁虽然被升任中书令，秩位高于太史令，但这是通常由宦官担任的官职，更使司马迁时时想到